

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

左玉河

【提要】 近年来,口述历史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本文在对近年来国内公开出版的口述历史著作考察基础上,对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冷静揭示口述历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提出了创建中国口述历史学科的基本设想:将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加以建设;强化口述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并组建专业化的口述历史研究队伍;推进口述历史项目的普遍实施;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创办口述历史网站及学术刊物;筹建中国口述历史资料档案库。

【关键词】 中国 口述历史 学科建设

近年来,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变及现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在中国(大陆)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口述历史的兴起不仅拓展了史料收集的范围,将活生生的口述史料整理并保存下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线索及必备的资料,而且扩大了历史文本的写作队伍,对口述史有兴趣的非历史专业的新闻记者、社会调查者都可以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可以收集、整理并刊印口述历史文本。口述历史在中国的兴起,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出现了关注社会下层、“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意味着历史学研究观念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历史文本的书写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人;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的研究者共同书写着刚刚逝去的历史文本,客观存在的“本然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的文本”之间结合的程度由此加深了。

一、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热点问题

中国(大陆)口述史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进展。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并取得较大进展。

(一)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

什么是口述历史?这是研究口述史时首先遇到并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欧美口述历史学界长期

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中国学界引入西方口述历史概念之后,也同样延续了这种争论。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① 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他们之间观点的差异是明显的:唐纳德·里奇视口述历史不仅是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而且包括了对这些资料进行阐释的“个人观点”;斯塔尔则将口述历史视为采访所得的原始记录,实际上等同于“口述史料”。中国学者在界定“口述历史”时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二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基础上进而提升到研究层面的东西。

“口述历史”概念分歧的背后,隐藏着“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差异。口述历史等同于口述史料吗?多数学者持否定意见,并主张严格将两者区分开来。有人指出:“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② 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现为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形式,但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概念的内涵是:收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纳德·里奇对“口述历史”概念的界定较为准确和合理。

口述史料包括当事人自己以口述的语言风格写下的文字性东西,以及别人为当事人的口述所作的记录。如果是他人所记,不应该是进行过大改造、加工的东西,而应尽量符合口述内容的原生态。若是经由执笔者加进了从语言形式到内容的过多加工和研究性创造成分,就成了包含“口述史料”而又有别于单纯口述史料的口述历史“著述”。这样的“著述”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成果。

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显然是有所不同的。这个不同,集中体现在它本身已经包含了对文献的查询。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润色的。而这种加工润色,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与文献史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内容进行筛选。界定“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两个概念之后,便会很清楚地看到,现在人们通常谈论的所谓“口述历史”,多局限于“口述史料”层面,并未提升到“口述历史”层面;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多是“口述史料”作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

(二)回忆录与口述历史著作

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出版了大量回忆录、访谈录,其中重要的有: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汪东兴回忆录》,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刘英自述》及黄峥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等。这些多是当事人口述或笔录并由整理者执笔完成的著作,是否属于“口述历史”范畴?对此,学术界存在着较大争议。

有人认为,“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而不仅仅界定为“亲历者口述的历史”。“叙述”的含

①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② 荣维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义显然大于“口述”,因为叙述除了口述外,还有“笔述”。回忆录、访谈录及人物传记等,显然是“笔述”的结果。按照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的界定,当事人无需别人代劳而自己用笔写下亲身经历,也算“口述史”之内。^①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当代中国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除了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收入外,还将带有较浓厚笔录色彩的汪文风著《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及李海文整理的《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等收入。因为这套“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可信的史料,故收入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是能够理解的。但将作者“笔述”的回忆录、访谈录纳入“口述史”,容易混淆“口述历史”的性质,因而有人质疑道:“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的书能说是口述史吗?这样收进去,就是名不符实,文不对题。”^②

通过录音访谈将口述历史记录加以整理成为著作,属于口述历史范围,是口述历史的主要方式,这是没有异议的。若把自己写的“笔述”也纳入口述历史,无疑扩大了口述历史的范围,或许真的存在着混淆“口述历史”自身特性的倾向。因此,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区分“访谈录”和“口述史”。访谈录是对受访者采访的一个记录,它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受访者经历的历史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受访者进行采访。可见,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历史。因为口述历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记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③

(三) 新闻采访、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

界定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概念差异,便易于弄清与此相关的口述历史类型问题。目前国内出版的口述史料(或口述史著作),主要有三大类。一是社会学家用田野调查方法整理的成果,如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驢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等。二是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法采制创作的口述作品,如张建伟的《男人之隐——四十岁男人生存现状访谈实录》、孟晓云的《非隐私访谈录——成功女性的独白》、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非非说周扬》、贺黎等人的《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等。三是历史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方法整理的口述史著作,如《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

这三类著作在口述方法、目标、重心及对象上有很大差别。前两者的目标不只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而更多地是把“口述”视为一种手段,并不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甚至并不在乎口述者说了什么,而是关注叙述背后的文化意义;后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口述史著作的撰写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加以互证,整理出文字记载的口述文本。究竟“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田野调查有多大的区别?究竟哪些人适合做口述历史访谈?

唐纳德·里奇明确指出,新闻记者做专题采访通常具有特定目的,他们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引导双方的谈话,更没有时间聆听长篇大论。有时他们也采用录音采访,但是在文章刊出或是广播完毕

① 程中原:《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第68页。

② 朱元石:《关于口述史问题的一些研讨》,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第77页。

③ 梁景和:《关于口述史的思考》,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第91页。

后,从不长期保留原始的录音带和笔录。因此,访谈要成为口述历史,必须是经过录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处,或者经过几乎是逐字重制的方式出版。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①因此,将口述历史访谈视为像新闻记者的工作,是低估了口述历史的难度,降低了口述历史的严肃性,容易引导口述历史误入歧途。这是需要学界警惕的。

唐纳德·里奇撰写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虽然认为从事口述历史不需要有历史学博士学位,但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去口述访谈,更不是任何访谈录音都能够成为口述历史。对口述史有兴趣者可以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收集和整理口述史料,但必须具有起码的口述访谈技巧和基本历史常识,必须接受相应的口述访谈专业培训。口述历史欢迎学界中人,也不排斥外行生手;任何人经由口述历史课程、培训班的专业训练,都能进行有用的口述史料收集与整理。

(四) 事件、人物与访谈对象

口述的叙述对象是人物和事件。口述历史访谈也相应地分为以人为主和以事件为主两大类。如果说访谈对象的选定在西方口述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引起过激烈争议的话,那么在“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大众史观流行的当今中国,不仅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而且显得更为宽容和大度,呈现出访谈对象“多样化”趋向。有人将口述史的重点放在要人大事上,采访重要人物,请他们讲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和实施经过,以及其间重要人物的功过、人民群众的作用等;有人则着力各种亲历者讲述重要人物的言行、重要历史事件的经历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口述计划是“请决策者系统地讲大事”,采集像《共和国要事口述史》这种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口述访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口述计划则趋向采集普通民众的口述史料,撰写像《中国知青口述史》、《回望一甲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这种贴近社会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口述访谈对象的开放性与多元化格局,为中国口述历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 记忆、整理及访谈参与

口述历史具有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故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误解。受访者的记忆是否可靠?口述历史能否给予“历史的真实”?口述访谈录音是否需要“加工”整理?整理过程中是否需要整理者的参与?这些问题在美国口述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引起激烈辩论。中国口述历史也深受美国这两种访谈模式的影响。有人认为应严守中立立场,默默地倾听受访者诉说,并将访谈录音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做到“有言必录”,不增加访谈者个人的倾向性,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访谈的“原汁原味”。有人则认为,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口述历史乃是双方共同参与制作的产物。因此,整理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

口述访谈中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①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8—9页。

的。真实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但口述历史要求的真实,不仅仅是口述访谈录音整理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所口述的“历史内容”的真实。后者显然远比前者更重要。因此,整理访谈录音无论再“真实”、再“原汁原味”,也无法保证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口述历史的真实与否,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与否,而不完全决定于整理者是否忠实于访谈录音。

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去的主观因素等,受访人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也不可能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这是口述历史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口述历史著作中大量反映口述者的“主观表达”要比“客观叙述”更好看,但其可信度往往相应降低,这是口述历史访谈中需要警惕的。

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材料来补充和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唐德刚在总结自己的口述访谈经验时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①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历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像唐德刚那样以相关文献补口述之不足而详加注释的做法,是口述历史中必不可少的,但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访谈者的介入及用文献补充,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著作时可以随意改变受访者的口述访谈录音。有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著作有“可读性”,在撰写笔法上采取了“灵活”一些的做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将会有损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这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这个原则,就是访谈者介入的最后底线。口述历史需要的是史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

二、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中的隐患及困难

目前国内各种冠以“口述史”名目的出版物大量出版并畅销,出现了较普遍的混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界限的现象,妨碍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不少隐患和困难。

一是理论先天不足并严重滞后。自20世纪80年代口述历史从西方引入中国大陆并在国内兴起以来,中国口述史学理论的阐发多着力于介绍西方口述史学理论,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性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既出版了保罗·汤普森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等著作,也出版了中国学者撰写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及《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但这些成绩仍然难以掩盖中国大陆口述历史理论异常薄弱、严重滞后的窘境。目前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不仅缺乏独到的研究成果,远未形成较为完备的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而且连口述历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也模糊不清,并时常发生争论,更不用说将口述历史提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加以建设了。

^① 唐德刚:《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二是口述历史研究缺乏必要的深度,缺乏比较专业的研究队伍。从总体上看,中国口述历史尚处于初始的采集、整理“口述史料”阶段,远远未提升到“口述史学”的研究层面。具体表现为:感想性的体会多而专深的分析少;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同时,口述历史的推进力主要不是来自学术界内部,而是来自社会各界的外力,是出版社、杂志社及电视台等传播媒体的强力运作,引导着中国口述历史的表面“火爆”。全国各地的口述历史研究者,主要集中于高校和专门研究所,这些研究人员多为本单位的学术骨干,肩负着繁重的科研任务,他们所进行的口述历史研究,主要是因为对口述史学感兴趣而进行的兼职性的研究,处于“业余爱好”层次。很多人在认识到口述史学的重要性之后,抱着抢救口述史料的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来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是抱着牺牲与奉献精神来从事口述历史访谈及研究的。这种学术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是从事口述史学必需的,但却是难以持久的,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加上没有正规的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依托,没有必要的经费加以支撑,从而导致口述史学发展缺乏有计划的长远规划,人们只是就自己感兴趣或有条件进行的口述历史访谈展开工作,那些急需抢救的人物及口碑史料难以有效地抢救。

三是口述历史实践缺乏工作规范。美国口述历史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不仅建立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协会及遍布全国的各地分会,而且制定了诸如《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与标准》及各种各样的《法律授权样本》,有了统一的关于现代口述史学的工作规范和法律规范。反观目前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呈现出各自为战、杂乱无章的局面,不仅缺乏一套关于口述历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和工作规程,而且从事口述历史访谈及整理者缺乏必要的口述历史常识及基本技能培训。制定口述工作的规范,是做好口述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保障。2004年成立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正在集中力量制定相关章程、规则、工作手册,在广泛征得有关专家的意见后,将提交该会理事会讨论通过,为中国口述史学界提供参考样本,给予口述历史实践以切实指导。

三、中国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构想

为了切实推进中国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为了将口述史学这门新兴学科真正地建构起来,既要求有志于口述史学的学者们脚踏实地地投入到口述历史的采集、整理与研究中去,更要求我们高度重视中国口述史学的学科建设,将口述历史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予以重视,切实推进中国口述历史向纵深发展。

为了尽快建构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史学理论体系,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重点应该集中于五个方面。

(一)强化口述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研究的方向及课题主要有:口述史学的学科定位;口述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口述历史访谈方法;口述历史的整理和编辑;口述历史的保存和传播;口述历史的法律和道德考量;口述历史的跨学科性质和应用;口述历史与记忆;口述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口述历史的相对真实性;中外口述历史比较;口述的规范化问题等。在此基础上,编撰一部国内权威的教材《中国口述史学(简明教程)》,作为全国本科高年級的必修教材和硕士研究生的选修教材;同时编撰一套《中国口述历史实用手册》,以指导全国有志于口述历史访谈和研究者操作使用。

(二)加强人才培养,组建专业化的口述历史研究队伍。以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依托,联合有条件的高校,举办全国口述历史高级训练营(培训班),把全国有志于口述史的学者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培训,请那些海内外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有心得的、有实践经验的专家,讲授口述历史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及口述历史的规范化问题,并指导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的技术操作训练。经过这样的专业培训,加上一段时间的口述访谈实践,一定会培养出一批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专业队伍,极大地推动大陆口述史研究工作。

(三)从事口述历史项目的研究,切实推进口述历史访谈的普遍实施。口述史学既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实用学科,很多理论和方法问题都来源于具体的口述历史访谈实践。因此,学科建设必须结合实际的口述访谈工作展开,必须开展一系列重要的口述历史访谈计划,推进全国各地的口述历史访谈项目的普遍实施,在口述访谈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提升口述访谈者的理论素养和操作技能。

(四)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定期举办不同类型的学术讨论会。为加强与国内外相关学术机构的联系和合作,及时交流学术信息和科研动态,拟建立官方网站和发布电子通信等方式扩大该学科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为了真正奠定本学科在国内口述史学领域的领先地位,计划尽快创办中国口述史学的专业学术刊物——《中国口述历史评论》(*Chinese Oral History Review*),先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待时机成熟后再转变为固定的正式期刊;继续组织出版《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丛书》及其他相关研究著作。

(五)开始进行图书资料库建设。由于口述历史研究在国内刚刚兴起,有关图书资料相当缺乏,国内大部分图书馆都没有大规模地购买相关资料,这给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可以考虑将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中文和外文口述历史资料,在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及省市和高校图书馆内,筹建专门的口述历史资料档案库,不仅负责收藏全国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而且收藏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中形成的相关音像文献档案。

中国口述历史的资源丰富,口述访谈的前途广阔,抢救口述资料的任务非常迫切,也非常艰巨。为年逾八旬的老人作口述,就是抢救宝贵的资料,就是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晚了就来不及了,大家一定要有紧迫感。很多人问我,如何才能做好口述历史。我的回答很简单:除了一套口述访谈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奉献精神。做口述历史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是为别人做的,写的是别人,并且这个版权最多你只有一半,另一半是受采访人的,这是默默奉献的事情。口述资料的采访、收集与整理,都是很辛苦的。口述史做好了,那是理所当然的;做不好,首先挨骂的还是口述采访及整理者。因此,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一点对历史负责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就根本不会来做口述史,也根本做不好口述史工作。有了默默奉献精神,有了历史责任感,然后才谈得上做口述历史。做口述史是很辛苦的事情,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做口述史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投身到这项事业中。

(作者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责任编辑:王旭东)

(责任校对:李桂芝)

Nakatsuka Akira and the Study on the Jiawu War//Dai Dongyang

Prof. Nakatsuka Akira, a representative of Japanese scholars studying the Jiawu War, has been engaging in the research of the Jiawu War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is work in this fiel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one is when he first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newly-released Mutsu Munemitsu Kankei Monjo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 Yamabe Kentarō, based on which he finished his works such as “Nisshin Sensō”. After 1977,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revision of Mutsu Munemitsu’s *Kenkenroku*, from which he found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details related to the Jiawu War. These details indicated that Japan had planned the war against China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Mutsu diplomacy was war diplomacy. After his retirement in 1993, based on his research of *Nisshin Senshi Sōan* drafted by the General Staff of Japanese Army which was stored in Satō Bunko, he exposed it was not an “accidental conflict” that led the Japanese army’s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Korean royal palace. Instead, it was a thoroughly deployed war plan,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Jiawu War was not “for independence of Korea” as propagated by Japanese authority. Nakatsuka Akira has always concerned with Japanese real motive and the nature of launching the Jiawu War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Jiawu War is an imperialist aggression against Korea and China by Japanese authority.

On the Taiwan Historical Narration by Japanese Colonist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ake the Unification of Taiwan by Emperor Kangxi for Example//Chen Xiaochong

The research of Taiwan history may be dated back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he investigation on local routines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accumulates the data base for such research, whil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pilation Committee organized by the Taiwan colonial authority (the Taiwan Sotokufu)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pilation of official Taiwan history. The general Taiwan history 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sts mainly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By comparison, it belittl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highlights governance promot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By such historical narration, it advocates the rationality and legality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occupation, and further consolidates its colonial domination of Taiwa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y on Oral-history and It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China //Zuo Yuhe

In recent years, the oral-history is valued universally by the Chinese academia, and also attracts wide attention in all sections of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ing the works and papers on oral-history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I will deeply analyze several important and hot issues of the study on oral-history in China, reveal the problems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furthermore plot out the plan of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e of oral-history of China. The plan includes: the oral-history will be constructed as a second-level discipline of the history;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 theory and methods of oral-history will be strengthened; the personnel training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professional force of the oral-history will be organized; the projects on oral-history will be put forward generally; the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ll be strengthened; the website and research journals of oral-history will be established and issued; and the archives on oral-history in China will be established.

New Trends in Recent Cross-cultural Studies//He Ping

Cross-cultural studies emerged as early as the late 19th century, when anthropologists like Edward B. Tylor and Lewis H. Morgan carried out field studies in many societies to explore pattern of cultural and